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旌勇里国史讲座

(第一辑)

田居俭 主编

JING YONG LI
GUO SHI JIANG ZUO



当代中国出版社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

旌勇里国史讲座

JING YONG LI
GUO SHI JIANG ZUO

(第一辑)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旌勇里国史讲座. 第1辑/田居俭、杜蒲主编.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4. 8

ISBN 7-80170-331-6

I. 旌… II. ①田…②杜… III. 中国—历史—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6962 号

责任编辑 杨文利 郑 珺
装帧设计 古手书道
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发 行 部 (010)66572157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印张 219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总 序

当代中国研究所是国家设立的专事编纂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的机构，也是一个成立时间不长的新单位。为了开阔所内研究人员的学术视野，也为了加强所内外的学术交流，更为了活跃国史学界的学术空气和推进国史学科建设，我们于2001年初开始举办月度国史讲座。讲座人主要邀请国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名学者，也邀请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者。讲座内容既有对国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究，也有对国史研究中某些专题的解析；既有国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也有其他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既有对学术观点的切磋，也有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讲座听众以所内人员为主，同时也请所外的研究人员和高等院校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前来。为了使更多关心和有志于国史研究而又不能前来听讲的人能够分享这些讲座的知识，我们决定随着讲座的不断延续，依次选择部分讲稿汇编成册，陆续出版。因为当代中国研究所位于什刹海附近的旌勇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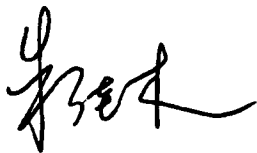
号,故将书名定为《旌勇里国史讲座》。

严格意义上的国史研究,是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始的,也是从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的研究中分离出来的。但党史是专史,而国史是通史,是断代史。因此,凡是对通史、断代史研究适用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国史研究也同样适用。然而,以往的断代史都是已经结束的、由极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历史,而国史却是正在发展着、由绝大多数人当家做主的历史。因此,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大利·克罗齐语)的话,那么,国史就更是“当代史”,更加反映当代人们对当代史的认识,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政治性。如果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龚自珍语)的话,那么,一切被推翻被赶走的敌对势力,为了颠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更会把攻击的矛头对准共和国的历史。因此,我们并不隐瞒对讲座人的选择标准,那就是:大陆学者必须站在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和尊严的立场上,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思想;而国外和境外学者,必须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友好态度,必须赞成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欢迎讲座人物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认识,并提倡不同意见的争鸣。正因为如此,收入讲座选集中的观点,有可能是彼此矛盾的,也有可能是我们所不赞成的。

在中国古代,曾经一度有过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情况。这首先是封建制度造成的。那时,所谓当代、前代均以帝王姓氏为标志来划分。在当朝帝王的统治下,史家写史必然颇多忌

讳，难以秉笔直书。另外，那时的交通、通讯、印刷等手段落后，各种资料的积累和信息的反馈需要较长时间，客观上也给当代人写当代史造成诸多不便。而现在，这些不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不仅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建国以来的文献档案被解密、编辑和出版的也越来越多，从而使研究国史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充分。更重要的是，在封建时代，历史只是少数统治者关心的事，而今天，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迫切希望了解当代的历史。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更希望通过总结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党执政的规律，通过正确反映新中国的光辉业绩，教育和鼓舞广大干部和群众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因此，作为国史编纂和研究专门机构的当代中国研究所，不仅要努力完成好党和国家交付给自己的任务，还有责任采取措施，积极扶持和振兴国史这门年轻的史学分支学科，而举办月度国史讲座，便是其中的措施之一。这个讲座将要继续办下去，讲座选集也将不断出下去。我们希望热心于国史研究的读者看过书后，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以便使国史讲座办得更好，使讲座选集更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2004年8月

目 录

1.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戴逸
----- (1)
2. 中国史学的遗产、传统和当前发展趋势/瞿林东
----- (15)
3.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道路的思考/陈其泰
----- (53)
4. 变动中的西方史学/于沛
----- (85)
5.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给我们留下哪些遗产?/逢先知
----- (111)
6. 老一代革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过程中的历史贡献/金冲及
----- (129)
7. 毛泽东与社会主义的中国/李捷
----- (145)
8. 论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的两大探索/梁柱
----- (163)
9. 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朱佳木
----- (187)



旌
勇
里
国
史
讲
座

10. 我国发展与改革的几个重大问题 / 王瑞璞

----- (227)

11. 新中国党的经济理论和思想的回顾与评析 / 卫兴华

----- (239)

12.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 吴易风

----- (271)

13. 中国近现代史对台湾民众心态的影响与对台工作 / 王在希

----- (289)

14. 关于当代中国边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马大正

----- (313)



中国古代修史 的传统及其对 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

JING YONG LI
旌勇里国史讲座
GUO SHI JIANG ZUO

主讲：戴逸



作者简介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清史研究。撰写或主编书籍40部，发表文章500余篇。

主要成果有：专著《中国近代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简明清史》1、2册(人民出版社)、《乾隆帝及其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持列入国家社科基金“六五”计划项目的《清代人物传稿》下(10卷)、《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上)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清史部分，主编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丛书(辽海出版社)、《中国近代史通鉴》10卷本(红旗出版社)、《二十六史大辞典》(吉林人民出版社)，与李文海共同主编《清通鉴》20卷及附录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修史的传统及其对国史研究的重要启示》，是作者2002年4月9日在当代中国研究所作的学术报告。原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编纂历史是一门大学问，中外古今许多历史学家都曾研究过。中国古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作《史通》、章学诚作《文史通义》论述历史编纂的理论与方法。中国近代的梁启超专门作《历史研究法》，总结了我国以往的历史编纂学，并吸收了外国研究历史编纂的一些成果。外国也有许多这方面的探索，如德国的兰克学派，英国的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的边疆历史学派，等等。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编纂法的，所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的、粗浅的知识，大概地作一介绍，可能有不妥当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编写历史的传统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从甲骨文、金文、《尚书》，到《春秋左传》，到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五帝本纪》黄帝记起，至汉武帝《今上本纪》，成为一部通史，略古详今，最详细的是秦汉时期。如此连续未中断的历史记载，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埃及、巴比伦也是文明古国，但它们那里变化很大，今天在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居民已经不是古代埃及和巴比伦的直接后裔，历史已然中断。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完整、系统的历史记录，关于中世纪的史书很少，有的需要依靠中国唐朝《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

而中国的史书十分丰富，中国古代将知识分类为经、史、子、集。“经”即古代圣人传下的十三经，“史”即历史，“子”



即各派学说——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集”即诗文集——主要是文学作品。史部列第二位，可见其重要性。

为什么中国历史有连续而未中断的记录，有两个原因。

一是因为中国人历史意识强，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

“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霸王之间的斗争），其文则史（文字成为历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包含的道理、观点，为孔丘得到了）”^①，表明孔子十分重视历史。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曾言：“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②，其子司马迁继承父亲志愿，作《史记》，流传后世。重视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且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历史。唐太宗，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历史记载的皇帝，二十四史中有八部是他与其子在位时完成的，占 1/3。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镜鉴”^③，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元世祖忽必烈，虽是蒙古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同样重视历史，言“不可亡前人之史，若不立史馆，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④，命令建立史馆，编纂历史。清朝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⑤，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和台湾，就禁止讲习中国史。人类社会有昨天、有今天、有明天，现在的

① 《孟子·离娄》。

② 《史记·太史公自序》。

③ 《册府元龟》卷五四。

④ 《元史·董文炳传》。

⑤ 《龚自珍全集》172页。

社会是过去的发展，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方法、政策，都是过去经验的总结。所以人类要开辟未来美好社会，离不开学习历史，总结历史，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吸取智慧。只有借鉴历史，才能够胜利地走向未来。中国人的历史意识非常强，这是一个优秀传统，也是中国有凝聚力的表现，是保证中国悠久文明传承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中国所以有连续不断的历史记录，还因为有制度上的保障，即开馆修史，专门设立国史馆，专门设立历史研究、历史编纂的政府机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优秀传统。

关于中国远古的史学机构记载较少，但《礼记》上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①。古代还有很多类似与史有关的官职设置，如内史、外史、太史等等。春秋战国普遍设有史官，所谓“孔子作春秋，观百二十国宝书”，“宝书”即指各国的史书。西汉设太史令，而且是世袭官职，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东汉设兰台，不仅是藏书机构，也是史学机构，其官称兰台令，如班固，也是世袭的，其父班彪，其妹班昭都供职兰台令。魏晋设有著作郎修史。魏晋后，分裂割据，出现了许多国家，许多朝代，虽然政权不稳，经常改朝换代，但都修纂自己的历史，非常盛行，出现了修国史的高潮。三国都有自己的国史，但多已失传，只有陈寿《三国志》流传，连同裴松之的注本都保存下来了。因为《三国志》不完整，只有本纪、传，没有志、表，裴松之的注释将其时的三国史料记载下来，保存了三

^① 《礼记·玉藻》。

国历史的丰富记录。晋人修晋史达 13 种,可惜未能流传。十六国修史书 29 种,其中 16 种是写国史,即本朝人修本朝史。南朝有很多史书,尤其是宋时,开设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个馆,史馆之名可能始于此。除记述当代史外,还有“起居注”,记录君王的言论行事,《魏书·经籍志》记载有 41 部两晋南北朝的起居注,这些著作只有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魏收的《北魏书》等少数史书流传下来,沈、萧、魏三书后来列入二十四史中。其他史书的失传既有社会原因,如战争多、印刷术不发达,也由于其自身的原因,多数为私人修史,所见不广,资料的搜集不完备,仓促成书,有局限性,水平不高,当更好的史书出现时,就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淘汰了。唐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私人修史转向政府修史,史馆设置正规化、规范化。唐太宗非常重视修史,从唐太宗到唐高宗,通过设立史馆修成 8 部纪传体史书,由宰相监修,如房玄龄、长孙无忌、魏征等,还有所谓御修史书,如《晋书》中的《王羲之传》等是由唐太宗撰写的。故《晋书》冠以御纂之名。这时,政府开始参与修史,正史的编写逐步制度化,成为政府行为。政府修史是必要的,因为历史所跨年度很长,数十年乃至数百年,资料很多,涉及人物事件复杂,史家个人的精力难以顾及,个人修史很难,并且越到后世,越不可能。唐初由史馆修八史,集体创作,国家领导支持,宰相监修,既有政治上的权威,也有学术上的权威。从此史馆修史成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史馆在修史中的地位、作用得到确立。唐朝国史馆除修国史外,还修“起居注”,记载君王言行,修“实录”,用编年体记国家大事,但流传至今的只有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

原书缺页

通——通典、通志、通考，地方志等等。中国史学评论也很多，并且明确提出了对史学家的要求。

作为史学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当被问及为什么文学家多而史学家少，他解释道：“史家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①，提出了对史学家三个方面的要求——即才、学、识。

所谓史才，是指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对史料的组织，要有条理性、逻辑性、生动性，文字要简洁，条理要清楚，叙人叙事要生动，文笔简练，又要抓住要害。典型的例子是新旧唐书和新旧五代史。宋朝大文豪欧阳修认为旧唐书、旧五代史修得不好，太啰嗦，叙述冗杂，于是重修新唐书、新五代史。新史修好后，旧史无人使用，以至失传了。直至清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了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大部分内容，拼凑还原而成，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并列入二十四史。欧阳修自称其书“事增於前，而文省於旧”。但后人也批评欧阳修“事增於前”，网络野史、笔记中的记述，不足为信，“文省於旧”，但唐朝文章用骈体文，新书将旧书压缩节略反而晦涩难懂。新旧唐书、新五代史，从其简要、文章条理而言，新胜于旧；从记事详细、保存史料多且完整而言，旧胜于新，各有千秋。

所谓史学，是指史学家历史知识的广博，掌握资料的丰富，考证史料的严谨。既要求史学家掌握各个领域的知识，又要求能鉴别史料的真伪。这一点，越到后代越难，因为现代知

① 《旧唐书·刘知几传》。

识领域更宽更广，而且史料积存越来越多。就拿清史来说，《清史稿》有 536 卷，《清实录》达 4000 多卷，这些还都是第二手资料，第一手如中央档案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达 1000 万件，而这一件并非是一片纸，而是一个卷宗，大的一件可以装一汽车，有 100 多人在管理这些档案资料。切实地掌握浩瀚的历史资料，很不容易。作为史学家就是要坐冷板凳，钻进去，下苦工夫。资料的海洋无边无际，一个人穷毕生之力也只能探索这片海洋的一个角落。掌握的知识越多，史料越丰富，才能获得更多的发言权。我记得《第三帝国兴亡》一书的作者利用纳粹档案，数量之多要以吨计。现在各国政府档案多得不可胜计，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50 余年的历史档案，用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来形容，不为过分。

所谓史识，是指立场、观点、方法，也就是说如何认识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规律，如何判断历史。尽管史学、史才很好，叙述很有条理，文章很有文采，知识也很丰富，考证也很精细，但只要认识错了，观点不正确，其著作也会丧失价值。

刘知几提出“才、学、识”，到清朝的历史学家章学诚提出“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①，是对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历史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要求客观公正地记录历史，秉笔直书，不溢美，不隐恶。中国古代史学家非常重视史德。所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②是两个典故。春秋时齐国崔杼权力很大，杀了齐庄公，齐太史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史德》。

② 文天祥：《正气歌》。